

# 盤點美國移民面談常見的幾個陷阱

移民面談擴大後,很多原本不必面談的移民類型現在都需要面談,而且問題越來越刁鑽“挖坑給你跳”,一言不慎可能滿盤皆輸。還有的移民官則不按常理出牌,讓申請人心驚。

移民面談會有很多刁鑽問題。移民面談擴大後,很多原本不必面談的移民類型現在都需要面談,而且問題越來越刁鑽“挖坑給你跳”,一言不慎可能滿盤皆輸。還有的



移民官則不按常理出牌,讓申請人心驚。洛杉磯市的王小姐表示,近日去移民局面談,很多問題刁鑽古怪。面試官問她,你投過票嗎?王小姐當然表示沒有,但面試官反問她,你為什麼沒有投呢?王小姐說,不是美國公民不可以投票。面試官繼續問下一題。王小姐表示,這道題表面上不難回答,但她覺得面試官反問她為什麼不投票,是在挖坑給你跳,所以必須慎之又慎,否則就陷入了面試官的怪圈中。

此外,還有一些人參加公民面試,雖然有固定的100題可以背誦過關,但偶爾也有面試官不按常理出牌,所以申請人最好將每一題的所有選項都背熟,以免被問倒。聖蓋博的張先生表示,在公民面試題中,第53題為,如果您成為美國公民,以下哪一項是您對美國做出的承諾?這題特別在“哪一項”的一字下划了着重號,意思就是只

要答上來一條就算過關,答案共有六條。但張先生表示,面試官問到這一題,他回答了其中一條,但面試官繼續問“還有呢”?張先生又回答了一條,面試官竟然還說“繼續”,張先生只好一口氣把六條都講了出來。面試官才翻過了這一頁。張先生表示,幸虧他把所有內容都背了下來,否則只按照最低要求背誦有可能會“卡殼”。

還有一些更不按常理出牌的面試官。華人趙先生表示,面談中,面試官問他沒有參與過 genocide 或 massacre,趙先生當然表示沒有。面試官繼續問他,“你給我解釋一下,什麼是 genocide 或 massacre”。趙先生表示,大概就是出于宗教或政治原因大規模殺



人吧。面試官這才作罷。趙先生表示,他自認為英語還不錯,但遇到這種名詞解釋題也是讓他冒汗。如果有些人英語不好,最好還是帶翻譯或者律師。此外,這也表現出面試官詢問不是流于形式,而是確認回答者知道題目的含義並且認真作答。

還有一些人因為過度緊張而導致不必要的錯誤。剛通過公民面談的李小姐說,面試官說了一句話讓她寫下來考察英語能力,這句話是“The White House is in Washington DC.”但她太緊張,竟然把 White House 寫成了 White。其實對多數人來說,可能拼寫 Washington 會有困難,但沒想到自己太緊張,卻將最簡單的詞寫錯了。

# 紐約時報重磅文章:華裔移民為何如此仇視穆斯林?

華裔少女申小雨遇害一事助燃了華裔移民心中對穆斯林群體與難民的仇恨與恐慌。多倫多北約克一座公園的一角,一名女性拿着的抗議標語寫道:“特魯多需要對被難民殺害的受害者負責”。

在2017年7月,一名華裔少女在溫哥華被人謀殺。13歲的申小雨在傍晚6點離開住所後失蹤,次日凌晨警方在臨近溫哥華的本那比市的中央公園發現了她的屍體。這起案件震驚了加拿大的華人圈,他們曾以為自己移居而來的國家不會出這種事。

時隔一年多後的9月10日,名為易卜拉欣·阿里(Ibrahim Ali)的28歲嫌犯被警方逮捕,並以一級謀殺罪起訴。但這起驚悚的謀殺案,卻因為嫌犯的身份開始變得複雜:阿里在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前,是來自敘利亞的難民。雖然警方沒有公佈兇手的作案動機,但是這起事件為一部分華人移民提供了一個“開戰”的藉口,助燃了他們心中對穆斯林群體與難民的仇恨與恐慌。

在案件取得新進展後的一周內,在溫哥華與多倫多,兩個中國移民數量巨大的城市里,有華人團體分別組織了對這名女孩的追悼會。但從現場來看,這兩場活動的確不僅僅是一場對逝者的悼念。在多倫多北約克一座公園的一角,集會的組織者擺上了申小雨的遺像,還有蠟燭與鮮花,出席追悼會的50多人佩戴白花或者白色的貼紙。但在這名13歲遇害女孩遺像的兩側,有兩條華裔組織者打出的醒目標語,攻擊加拿大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的難民政策。一張標語寫著:“特魯多正在危害加拿大”。另外一張寫著:“特魯多需要對被難民殺害的受害者負責”。

在加拿大的華人移民當中,一股右翼勢力正在迅速抬頭。尤其是在過去一年,該群體先後爆發了“頭巾門”與“反對難民”集會兩起群體性事件。這使得加拿大的這股右翼勢力進入更多華人的視線。或許在這一部分右翼勢力的眼中,自己辛苦勞作與稅收所創造的社會福利被難民或其他少數族裔瓜分了不少。如同在美國的部分華人移民一樣,他們將矛盾的源頭指向了這些少數群體,其中包括穆斯林與難民群體。

在中國,我們可能對移民發達國家的人懷有一定的誤解。有的人會認為,這些依靠自己的財富或者本領移居海外的人素質會高一些。但從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的表現來看,這並非事實。雖然這些右翼華人移民並不能代表大部分來自中國的移民,但他們的存在卻在製造十分負面的刻板印象。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上,他們瘋狂地轉發、製造對穆斯林及難民群體的仇恨。比如,在加拿大本地中文網站上,有人這樣評價受到緬甸當局迫害的羅辛亞人:“羅辛亞人,其實就是木死林(穆斯林)邪教徒,是土豆(特魯多的綽號)的繼父們。”

這些中國移民的仇穆情緒或許在諸多國內外的恐怖襲擊動亂中得到了證實,但這股仇恨的源頭更有可能來自他們的原生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統戰少數民族的政策使得人口佔多數的漢族主體感到不公。近些年來的襲擊事件又再次將中國漢民的仇穆情緒推上了巔峰。

在2015年特魯多贏得大選後,便接收了來自敘利亞的2.5萬名難民,據加拿大政府公佈的數據,截止2018年7月底,加拿大政府接納了近5.7萬名敘利亞難民。但是,自2015年以來,各省選民對聯邦政府的難民政策越來越反對,他們稱省內的財政資源無力安置這些難民。在2018年,他們的反對態度在近期的各省大選中有所體現。在安大略與魁北克這兩個加拿大最重要的省份,都選出了在移民與難民政策上更加保守的右翼政黨執政。

同時,加拿大政府2015年至2018年每年都接收超過30萬的移民。這些移民多數來自菲律賓、印度、中國等亞洲發展中國家;中國新移民數量在過去三年內排在第三,在2016年一年,便有近13萬中國人來到了加拿大。在溫哥華,共有約48萬華人,佔人口總數約21%;在大多

倫多地區約有70萬華人,佔人口總數約12%。其中部分移民加入了反移民的浪潮,於是有了瞭如下的諸多鬧劇。

這股勢力的存在已有一段時間,但促使事情爆發的導火索要回溯到2018年1月發生的“頭巾門”事件:在多倫多,一名11歲的穆斯林女孩宣稱,自己的頭巾被一名亞裔男子拉扯掉,這起潛在的仇恨犯罪引起了總理、省長以及市長的重視。然而在警方調查後,卻發現這件事情根本沒有發生。

雖然涉事的女孩與家人已經道歉,但一個名為“加拿大華人聯盟”的組織認為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也應該向華人道歉,並要求對所有種族一視同仁,並重啟對“頭巾門”事件的調查。2月18日,該機構組織了上千名華裔移民,前往渥太華向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抗議。但奇怪的,是與他們站在一起的,卻是La Meute、Storm Alliance、Northern Guard這些在加拿大臭名昭著的極右翼組織。這些組織的核心訴求是反對移民與難民,加強邊境控制。根據加拿大華人聯盟的聲明,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支持任何的極右翼政策,也不認為自己是一種極右翼組織。但他們與極右翼組織在一起抗議,場面令人尷尬。

2018年7月,另一群華裔市民來到萬錦市(Markham)市政廳,抗議該市協助位於南邊的多倫多市安置難民。在這些華人移民的眼里,難民意味著暴亂和不安。但在抗議的現場,他們與反示威的群眾爆發了衝突。根據現場視頻,一名華裔男子將反示威者帶來的手提擴音器扔進水中;另一名華裔女子與他人發生衝突時滿嘴污言穢語:“X你媽了個X的”、“我X你佬佬的”;一名戴着眼鏡的男子用不成熟的格鬥技巧與他人打鬥,卻沒佔到任何便宜。

這些事件與醜態不得不令人深思:為什麼不論這個社會怎樣看待他們的行為,這些右翼華人都會堅持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並堅持自己的想法?

9月中,我圍觀了他們在多倫多的追悼會。我十分好奇,出席這場會議的都是些怎樣的人。我加入了他們的微信群,觀察他們在群里都說些什麼。在這個人數將近200人的微信群中,每天都有人反對特魯多總理的多元文化政策,還有人發表仇視穆斯林的言論。他們稱基督教衰弱之時,就是伊斯蘭得逞之日。他們稱要將總理殺了,炒他的魷魚。還有人說,加拿大再過幾年就徹底綠了,意指將徹底伊斯蘭化。

組織多倫多悼念活動的人與申小雨並無血親關係。因此,也有人認為,他們的活動是一場純粹的政治投機。在追悼會上,各色人等分別登台演講。他們都認為外來的難民使得加拿大變得不再安全。在上台演講的人當中,有一些華人期望在10月份大多倫多地區各個城市的市級選舉中競選公職,包括萬錦市市長、多倫多市議員和學校區的教育委員。他們出席活動,更像是試圖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在人群中,我發現了加拿大右翼媒體Rebel Media與正在競選多倫多市長的極右翼候選人費斯·戈爾迪(Faith Goldy)。諷刺的是,戈爾迪曾在自己的推特中稱,來自中國的移民抬高了多倫多的房價,因此不應該歡迎他們的到來,“多倫多市不應該成為北京的郊區”。(在多倫多35位市長候選人中,除了戈爾迪,還沒有人說過這樣對華人族裔不友善的話。)

我在一旁拍照時,一名路過的長者叫住了我,並問我這裡發生了什麼。當我告訴了她事情的前因後果後,她不解地問道,“事情發生在溫哥華,為什麼要在多倫多舉行追悼會呢?這些組織者認識受害者的家人嗎?”

這位長者心中的問題也是我想要詢問的問題,在追悼會結束後,我試圖採訪這次活動的組織者與部分參與者。但採訪並不順利,在試圖與幾個人聯繫後,我發現自己已經被組織者從他們的微信群中移除。以至於在採訪進行到一半時,有兩名受訪者突然變卦,不再繼續與我交談。而三位受訪者的觀點與特朗普的支持者們高度類似:他們反對接收難民,反對承擔國際

義務,甚至還有人認為,加拿大應該學習美國,拒絕讓一些伊斯蘭國家的人入境。

一名名為Alex Yu男子的言論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認為,申小雨的死都是總理特魯多一手造成的。“他敞開邊境狂收難民,導致了這些慘劇。”Alex(他不願意透露自己的中文名字)認為,自由黨政府原來的難民部長胡森(Ahmed D. Hussen)是穆斯林,總理的偏好很明顯。他還提出,特魯多可以任命一個中國人做難民部長,來顯示他沒有對穆斯林特殊的偏好。

當我問到為什麼在時隔一年後才為遇難者組織追悼會,他回答:“因為大家沒認為會是穆斯林難民干的,以為是普通獨立的刑事案件。”他接著說:“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可以上升到政治程度的。但是這件案件是一定要上升到政治程度的。”

Alex Yu並不認為費斯·戈爾迪與Rebel Media這些組織是極右,他同時對我說:“在極左的眼里,別人都是極右,不要隨便給別人貼標籤。”他並不知道戈爾迪曾在推特上發表過“反華”言論。當我發給他時,他認為,這並不是對中國人的歧視,這個帽子扣得太大了。

Alex言論證實了我的想法,事實上,有批評者認為申小雨案成為了一部分華人政客的政治提款機。在本地的中文網站上,這樣的觀點遭到了部分網友的攻擊,甚至有人攻擊寫文章的作者有維吾爾血統。

另一名來自中國的移民Linda Li來加拿大後成為了兼職地產經紀人,同時經營一個做物理治療的小生意。她認為難民的安置與非法入境者浪費了許多納稅人的稅款,用她的話說:“我們勤勤懇懇地工作,每年都交很多稅。國家這麼揮霍浪費,我們這些納稅人當然憤怒了!”

Linda表示,她出席追悼會僅僅是因為想要悼念這位遇害的華裔少女。她同樣認為特魯多的難民政策太混亂,儘管警方沒有發現嫌犯在此前有過任何的犯罪記錄,但Linda並不相信警方的說法。她認為加拿大政府根本沒有對入境的難民進行審查。事實上,入境加拿大的難民需要經過簽證官的面試,並通過情報部門的背景調查與體檢。

但很明顯,Linda並不能被稱之為種族主義者:她不喜歡費斯·戈爾迪,在看過那條具有歧視性的推文後,她表示不會再支持戈爾迪。她認為大多數華人都是勤勞善良的,也不應該仇視外來族裔。

解民正在為10月的多倫多市選舉做準備,她將競選多倫多第12選區的教育委員一職。作為這次追悼會的組織者之一,她表示在看到申小雨案有進展後,覺得應該做點什麼。她認為加拿大政府今年接納的敘利亞等穆斯林難民不會融入西方文化,“移民一定要考慮到文化價值觀可能融合的問題!否則歐洲的今天就是加拿大的明天。”

我並不確定解民是否知道,她對這些難民的看法與100多年前,加拿大第一任總理約翰·麥克唐納(John A. MacDonal)對中國移民的看法高度一致。麥克唐納認為,這些來為加拿大修鐵路的中國移民永遠無法融入加拿大的體系之內,當時的中國人,被稱之為“黃禍”。在美國,華裔移民也曾受到類似的歧視,立法者也曾設立過針對華裔的排華法案。

到底是什麼,讓這些右翼華人產生了這些想法?

不可否認,在這些移民的原生國家,仇視穆斯林的言語在社交媒體當中十分普遍,網民也瘋狂地嘲諷着政治正確,而宣傳部門有時似乎並不太介意網民對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的攻擊。比如,在近期中國與瑞典的外交風波中,大量的微博賬號捲入了對瑞典的言語攻擊,期望他們被穆斯林難民攻佔。木木、綠綠等名字成為了這些網民對穆斯林群體的蔑稱。如果身處中國網絡防火牆外的這些移民依然需

要依賴微信、微博等防火牆內的中國社交媒體工具瞭解當地信息,將極大地阻礙他們獲得真實準確的信息。

在近些年,中國也成為了恐怖組織威脅的目標。伊斯蘭國曾經綁架並殺害了幾名中國公民。此外,曾經發生在中國的維漢矛盾也加深了人們對少數群體的敵視。2009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街頭暴亂成為了維漢矛盾爆發的重要節點。2014年3月1日,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車站砍死31名平民。再加上維族“小偷”、“切糕”等流傳于中國互聯網上的負面印象,生活在中國內地及沿海地區的漢族人對維吾爾人的印象開始顯着惡化。

同時,曾經被中國共產黨用來統戰少數民族的“兩少一寬”政策也使得漢人對維吾爾人感到不滿。這些對少數族裔,尤其是穆斯林少數族裔的負面偏見,跟隨着他們來到了移民國家。這個在西方標準下看來具有特權性的政策在1984年由胡耀邦推出、中共中央紅頭文件下發,其核心宗旨是對於少數民族的罪行採取寬恕的態度,“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要儘量從寬”。更多反對難民政策的華人移民更覺是Linda自述的那樣,認為自己辛辛苦苦的勞作繳納的稅款沒有用在合理的地方,卻供養了這樣一批無需工作的“特權”階級。

中國封閉式的宣傳為移民們種下了一顆惡果:這導致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不會對看到的消息做出基本判斷,不會產生懷疑,也鮮有調查消息來源的興趣。我所供職的本地中文網51.ca的同事曾經做過一個惡搞的釣魚實驗,他們選取了一段多倫多防治艾滋病遊行的視頻,在視頻里有大量的穆斯林民眾。他隨後將視頻發佈到一個100多人的微信群中,改稱這是穆斯林要求在加拿大實行沙里亞法。該微信群中立刻出現對穆斯林的辱罵,卻沒有人在意這條視頻到底從何處而來。

這是一個存在于全世界社交媒體的問題,但對於身處加拿大的華人移民來說,他們在微信里收到的信息是經過當地中文媒體編譯後的二手信息。這意味着,他們看到的信息,與原始事件之間的差別,可能要比在社交媒體當中看到的無需翻譯的內容偏差更大。

社交媒體的錯誤信息等因素之外,這部分華人移民的恐懼,或許能夠解釋他們對穆斯林及難民群體形成偏見的根本原因。

對於他們來說,加拿大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擁有的醫療資源、教育資源,及能夠提供給納稅人的經濟保障。但在加拿大,擁有新聞自由的媒體報道了許多發生在城市內的犯罪案件。與依靠時常封鎖消息的中國公安相比,加拿大顯得治安混亂,這無疑讓這些為了更好生活環境的華人移民感到恐慌:他們認為,這裡發生的一切,對他們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脅。

而將這些威脅怪罪于恐怖主義與難民是一種成本十分低廉的做法:這樣的邏輯看似十分合理,但實際上卻缺乏事實基礎。不過,處在焦慮與恐慌的人不會在意這些,他們只想為自己心中的焦慮找到一個發泄的出口,而這個出口,便是他們眼中的社會負擔:難民。

Chauncey Jung,移居加拿大六年,目前就職于多倫多本地一家中文新聞網站。

